人民领袖周恩来

大家好，我们是第二组，今天我们带来的故事是人民领袖—周恩来。

首先我们先来走进周恩来在黄甫军校的时光。

在大革命洪流中，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清除陈腐污垢，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又重新订立了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肖楚女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一时间，在军校师生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刊，注重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政治局面。

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入学后，党员人数有所增加，周恩来和陈延年遂决定将学生中原党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直属广东区委领导。同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等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左派革命军人。这些共产党人他们日后投身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用青春与生命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产物和重要见证。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开创的政治教育模式，对中国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昌起义被认为是我党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将党所掌握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党中央决定，周恩来任书记，而在7月29日，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从九江连发两封密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再做起义与否的决定。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前委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不可动。”张国焘认为起义要争取张发奎的同意方能举行。李立三质疑道：“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起义工作热火朝天，已是箭在弦上，大多数人都对张国焘传达的消息不解，更不愿意相信，纷纷对其指责。

　 一向温良谦善的周恩来也因此气得怒拍桌案。20多年后，周恩来在回忆南昌起义时还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生平第一次。”

第二天，1927年7月31日，继续开会。在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后，迫于压力，张国焘不得不同意起义。

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作为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曾长期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参加了从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国共彻底反目之间的历次重要谈判。谈判中，周恩来始终以不损害中共根本利益为原则，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的让步和通融。

1937年1月24日，他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进行让步的界线，即“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有了上述界线，便可以“不争名位与形式”，蒋介石虽然不满意这些让步，但迫于形势，他也不得不在此基础上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实行共同抗日。

蒋介石提出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的理由是共产党也信仰三民主义，如果全体加入有困难，可以让一部分先加入。周恩来答复：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国民党并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

1946年2月，国共双方达成了一个整军方案，确定国共双方的军队数量为50：10，即国民党军队编为五十个师，共产党军队编为十个师。这个比例乍一看的确让步太大，共产党内部也有人百思不得其解。

周恩来却指出：“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经过周恩来这么一解释，说明中共在谈判中所作的让步，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有得必有失，失小而得大。

1955年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顺利开幕。在18日下午至19日的全体会议阶段，大部分国家代表的发言都呼吁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然而，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中国代表团如何回应受到的高度关注，请跟随我们小组一探究竟。

“求同存异”理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而且为化解国家间的分歧提供了有效方案，在关键时刻避免会议误入歧途。接下来，周恩来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提及的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短短18分钟的发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为会议找到了一条避免对立继续进行的路线，成为会议走向成功的转折点。

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对于会议决议和宣言的起草问题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评论的：“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谈判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谈判桌上虽不见硝烟弥漫，但唇枪舌战也足以令人心力交瘁。周恩来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谈判天才，言辞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其论理、气度和分寸感折服了所有的谈判对手。他善于以适当的让步和通融打破僵局，争取主动，但如果要他放弃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谈判桌。也许这就是他“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少年壮志吧。

上天降国士与中华，欲救中华于水火，欲救人民于灾厄。国士不负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今，国家繁荣，盛世依旧，如您所见。以此，敬那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